

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 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

黄月琴

摘要

自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引入国内以来，就处于“可欲与可得”的困境之中。本文以德勒兹主义为思想路径，从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和阐述中国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与变化的轨迹。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象征资源“褶皱”运动的衍生物，“生成”、“游牧”与反思性是其基本特征，即一种自由精神的实验与实践。德勒兹主义的路径提示，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不是再现或者规范，而是激发人们对当下的不同思考，督促人们不断进行新型实践，以发现、链接和开创不同的逃逸路线和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德勒兹主义、象征资源、褶皱、游牧空间

作者简介

黄月琴，新闻学博士，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电邮：hbuhyq@126.com。邮编：430062。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湖北省教育厅2013年青年项目（No.139007）的资助。

The Fold of Symbolic Resources and Nomadic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 Deleuzism Approach

HUANG Yueqin

Abstract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in a dilemma of “desirability and acquirability”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aking Deleuzism approach as method, this paper is to re-understand and re-elaborate the production and the track of chang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with a perspective of post-structuralism and cultural study. As ramification of the fold of symbolic resources movement, “becoming”, “nomad” and anti-thought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which also means an experiment or practice of freedom spirit. Whe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discussed, a Deleuzism approach implies the most important is not representation or normalization, but to inspire the different thinking about Chinese reality. And it can urge people to find, connect and create different flight lines and possible spaces in practice.

Keywords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Deleuzism, Symbolic Resources, The Fold, Nomadic Space

Authors

Dr.Huang Yueq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Hubei University. This paper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youth project of Hubei education affairs ministry(No.139007). Email: hbuhyq@126.com.

从1990年代开始,在新闻实践领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技能和操作方式逐渐得到许多新闻人的认知与认同,并形成一套新型的边缘突破性的实践话语。(陆晔,潘忠党,2002;潘忠党,陈韬文,2004;吴飞,2009)新闻专业主义价值理念的输入是1990年代新闻改革的表征,它与稍早前的“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概念一道,标示着新闻实践模式的扩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激化和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实践(李良荣,1995),并成为新闻实践的替换性象征资源(潘忠党,1997)。声名远播的《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就鲜明地表达对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新型价值理想的追求(陈阳,2008;郭镇之,2014)。新闻专业主义价值在意识形态“前台”的浮现推进了中国新闻业改革,激发和鼓舞了更多新闻人的专业自主意识和职业道德勇气。时至今日,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日渐衰落,新闻专业主义在市场逻辑挤压、新媒体技术驱逐和新闻操作空间日益逼仄的情势下,似乎走向了一个“死胡同”。许多人重新审视新闻专业主义本身并质疑它在中国的现实可能性。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新闻人的专业价值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思想内涵与历史资源上并不一致(芮必峰,2010;宋志标,2011;李金铨,2013);也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依据西方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典型想象,它夸大了社会推动国家体制性变革的能力,因而与中国新闻实践的总现实相去甚远(周翼虎,2011)。

在这种“可欲与可得”的困厄之中,如何重新理解并反思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的勾连,应是把握当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关键性路径。本文暂且搁置

“中国有无新闻专业主义”这一争议,也不预设它对中国新闻业的规范性和前瞻性这一思路,而引入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思想资源,借用德勒兹的“眼睛”和他所创造的一套概念,来重新理解和洞察新闻专业主

义的产生、处境和意义,也即,采用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展开分析。这种理解路径,首先,是将新闻专业主义置于情境连续性和象征资源的“褶皱”(fold)和“地层”(strata)中进行讨论,来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成(becoming);并且反思这样的问题:在“古”与“今”、“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政治与技术的多维论述框架中,我们是否在认识论上特权化了某一维度,而导致与实践上的背离?再次,是将新闻专业主义置于“去情境性”和“去辖域性”的游牧空间,引入外部参照与“刺入”物,考察这一空间所构筑和凝聚的话语,来探析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成性,也即它的“跨文化旅行”(郭恩强,2011)及其“地方性”编码。本文将普利策新闻奖视为一个这样的外部“刺入”物。作为承载西方新闻理念的精神装置与现代仪式,它一年一次周期性地介入新闻人的话语论述“河流”,激发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想象与公众讨论。用德勒兹的语言,普利策奖是一个无根的生成“新”的“块茎”(rhizome),一个精神和思想的游牧空间(nomadic space),具有独特的分析价值。

一、德勒兹的思想、概念及分析路径

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之一,其影响力与福柯、德里达并驾齐驱。德勒兹的著作《差异与重复》、《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以及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合写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政治、经济、管理、美学、建筑、艺术、心理学等各个学科影响广泛而深刻。在媒介研究领域,德勒兹思想主要用于影像哲学、赛博空间和数字媒介的研究。2006年11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曾举行“德勒兹研讨会:论媒介与运动”,进行专题讨论。他以差异哲学和游牧美学观照数字新媒介,其名著《千高原》开篇提出的“块茎”论,更被视为“游牧”星球——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Marks,2006;麦永雄,2007)。但是总的来说,德勒兹的意义和重要性还远未得到新闻学与传播学者的重视和发掘。

德勒兹创造了一系列富有寓意的哲学和美学概念,回应现实社会的挑战。他从休谟、斯宾诺莎、柏格森、尼采等哲学家那里汲取思想,将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中很多特征加以新的限定和诠释,提出“褶子”(fold)、“游牧”(nomad)、“块茎”(rhizome)、“生成”(becoming)、“逃逸”(flight)、“机器”(machine)、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等经典概念。德勒兹的概念和语言风格极富个性,寓意深刻,有时晦涩难懂,故本文先对几个涉及到的概念略作陈

述:

(一) 褶子 (褶皱) (the fold)

在1988年出版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中,德勒兹发展了褶子(又译为“褶皱”)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意义是提供了异质事物之间的认识论和审美图式。在德勒兹看来,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褶皱无处不在。“褶子象征着差异共处、普遍和谐与回转迭合(德勒兹,1988/2001: 375),体现一种无穷尽的生成过程和连续差异性,褶子的折叠与展开(fold-unfold)形成事物的退化与进化,也意味着事物的辖域化(territorialisation)与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并使事物呈现出碎片化和未完成的面貌。

褶子在知识和权力的作用下褶曲变异,从而使主体成为一种多元交叠的、动态流变的创造性主体。思考,就是知识、权力和自我的折叠,产生从域外到域内的逐步深化的主体化过程。主体的内部和外部不是割裂的,而是一种“拓扑”的关系,“拓扑空间使得最遥远的外部与最深层的内部发生联系”(德勒兹,1988/2001:159)。

(二) 游牧(nomad)

在褶皱概念的基础上,德勒兹创造并发掘了游牧及游牧空间(nomadic space)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哲学价值体系。在著作《差异与重复》中,游牧意味着由差异与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游牧的目的即是为了摆脱严格的符号限制。游牧思想是一种否思(anti-thought),反对理性(束缚),推崇多元。它不寄寓于有序的内在性(interiority),而在外在元素中自由运动(陈永国,2010:12)。

游牧者是既定秩序与权力等级(德勒兹表述为“国家、律法以及logos”)的反抗者和战斗者。德勒兹用围棋与象棋的例子来说明游牧者(战争机器)与国家装置(功能是通过暴力进行束缚、攫取或直接捕获)的不同以及游牧空间和国家空间的不同。象棋的棋子之间是等级性、结构性关系,它们与对方的棋子是一一对应的对抗关系。围棋的棋子却没有任何专属的名称。它们是匿名的、集体性的或第三人称的。它们没有固定的属性,只有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功能。围棋棋子的关系是外在性的,彼此之间没有等级区分:一颗围棋棋子是陷入绝境,还是歼灭另外一颗或者一片棋子,完全视情境而定。围棋的空间是开放性的,棋子在完全开放的空间中运动,并使空间充满各种可能。国家装置如同象棋,对主体及空间编码,而游牧的战争机器如同围棋,脱离秩序和结构,总是从外部在进行结域和解域。(邵蓓,2014:125)因此,游牧空间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没有预定结构和既定目的空间。

（三）块茎（rhizome）

“块茎”是德勒兹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其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的标识，也是他所采用的重要论证方法之一。“块茎”是一种植物，但不是像树一样向下扎根的根状植物。块茎没有基础，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点。块茎在地表下蔓延，扎下临时的而非永久的根，并借此生成新的块茎。如同马铃薯或黑刺莓树一样，一旦砍去地表的秧苗，剩下的就只有“球状块茎”了。一个球状块茎就是一个“点”，点的链接就是这种生长的结果，这个生长的过程也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生成”（汪民安,2013:6）。“块茎”是德勒兹式的哲学图式，是与等级化的树状结构相对立的一个概念（陈永国,2004），用以描述生成的又一种模式：点状的生发与网状的连接。

（四）逃逸（flight）与生成（becoming）

“我们觉得一个社会的特征与其说由其矛盾所决定，不如说由其逃脱线路所决定。社会到处有缺口……”（德勒兹,1995/2005:196）逃逸是对权力的抵抗，是对自由的寻找。逃逸绝非要逃避世界，而是使世界得以逃逸，使被捕获的个体得以逃逸，使僵化的社会系统朝向各个方向逃逸。所以，重要的是要创造逃逸线，逃逸线是出口、缝隙和链接的可能性。创造逃逸线意味着创造自由，创造新的生命。（德勒兹,伽塔利,1987/2010:283）逃逸就是解辖域化和生成。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阐释了他的生成论思想。生成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变动或抽象的连接，而是在现实的不同层面对特定的主体和权威的解域，是逃脱禁锢和压制。生成没有终点，始终处于居间（in-between）。生成“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目的”（德勒兹,伽塔利,1987/2010:416）；生成还意味着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二、象征资源“褶皱”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成”

象征资源是新闻从业人员在某一特定新闻体制下，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类别纲目和阐释框架，它们既可以来自本土，也可能移植与引进。（潘忠党,1997）中国新闻事业的确立和发展从来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外部价值模式的输入和内部需求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无论是20世纪初北美新闻模式的移植，1950年代后的苏联宣传模式的覆盖，还是1990年代后期新闻专业主义价值的输入，都共同书写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记忆，形塑了中国新闻业的话语、主体和制度，它们与中国的士人传统、文人情怀以及喉舌观念一道，以某种方式沉淀为中国新闻业发展的象征资源。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情境中，它们

或隐或显，或沉潜或浮跃，迷宫般回转叠合，差异共处，恰如德勒兹所说的“褶皱”（fold）状态。褶皱寓意着差异与共生，也蕴含着事物的创造性和自由空间。（汪民安,2013: 171-174）

中国新闻业所汲取的象征资源及其话语从来都不隔绝于外部世界，但又一直处于“夷夏之辨”、本土与西方的困境之中。事实上，当今新闻从业人员所经历的宣传模式与专业模式的频繁切换与撕扯，是多种脉络的象征资源在行业记忆和价值传承上不同投影的表现，也是历史意识形态与新闻人主体实践时而调和时而疏离的结果，这种矛盾与分裂必然会在制度结构的要件和链条上进行复制，并通过不同方式“逃逸”出来，形成差异和碎片。用德勒兹的语言，就是处于褶皱的折叠（fold）与展开（unfold）的运动之中。在其中，新闻实践者的主体性得以生成并不断进行结域与解域化运动，形成一种“临场发挥”的实践理性。

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这种结域与解域的运动之中衍生而成。它的基础既有符合历史文脉的部分，也有呼应现实和实践要求的部分，也是精神游牧和思想理念化的结果。正因为它是生成性和逃逸性的，在实践空间，如既有研究所述，它表现出碎片化、局域化、情境化的特征(陆晔,潘忠党,2002)，其生存必须在权力、体制与话语的裂缝中寻求空间。

学者潘忠党在1990年代讨论中国新闻体制改造时，把新闻业象征资源分类为权威象征资源和改革型象征资源(潘忠党,1997)。如果我们今天再盘点中国新闻业的象征资源，可以更细致地进行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象征资源分类

类型	概念化	描述或相关词汇
权威象征资源	党的新闻事业	马克思主义、宣传、喉舌、中国新闻奖
历史型象征资源	文人论政	“底色”、“立言”、“妙手著文章”、家国天下、“为民请命”
民间（浪漫）型象征资源	侠义精神	江湖、扶危济困、仗剑走天涯、侠肝义胆、“铁肩担道义”
改革型象征资源	西方传播论	信息、传者、受众、传播、公信力、解放思想、抓住机遇
	市场绩效主义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本-效益、广告、新闻民工、媒介转型、媒介融合
衍生型象征资源	新闻专业主义	独立自主、客观真实、社会责任、碎片化、局域性、实践性、普利策新闻奖

在中国，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20世纪末期的新闻改革年代，一般认为是西方理念引入的结果，但实际上并不简单如此。新闻专业主义大致包含三个理念层

面：独立自主的立场，客观真实的新闻操作，以及社会责任伦理。我们可以试着分别阐述。首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出现的社会基础建立在1980年代“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的新闻传统”的背景之下，是对过去阶级斗争年代摒弃新闻规律的一种反思。重拾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因而是一种体制性承认的合法行动。其次，1980、1990年代的新闻事业还未受商业逐利原则的侵蚀，又高扬理想主义大旗，新闻人的党性原则、知识分子底色或潜在的侠义意识使得新闻业保持严肃的面貌，社会责任伦理特别是西方新闻界所面对的那种垄断、资本化和娱乐化的伦理问题不显著。再者，市场化改革重构并扩展了新闻操作的社会空间，经济资源上的充沛和与国家权力的分离，促使新闻从业者及其组织萌发一定的职业意识和自主意识，并激发舆论监督和第四权力的想象。在这些本土情境之上，1990年代后西方新闻与传播学理念的引入，为中国新闻业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和有力的词汇：新闻专业主义。

象征资源既是一种思想资源，也是新闻从业者赖以思考和表述其从业行为的概念或词汇。它们依据主体的意识和实践需要而被安置在不同的话语序列，有时被推到“前台”，浮跃出地表，有时隐匿于“后台”，或沉潜于（个体、组织和社会）意识的深处，状如折扇的曲面或风琴的脉络，因此象征资源不是割裂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在其内部，知识、权力与主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张力的关系，使象征资源呈现出差异的竞争的和交融的动态变幻。

象征资源是开放的文本，它们通过主体的活动而显现、隐匿或跃出，依情境和需求而变异，不断孳生、繁衍和更新。德勒兹指出褶皱的创生性在于“激活互文逻辑，展示开放性的多元结构，其内部充满自律与互动性，可以进行开放式的思想游牧”，象征资源内部存在着磨合与冲突，而有时又相互援引，相互注释，同时使用（潘忠党,1997）。

象征资源的存在是差异共处、回还迭合的，无论它们之间是继承、互文、扬弃的关系，还是转折、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关系，都始终处于历史“绵延”过程之中。新闻专业主义是这个“绵延”体中的衍生物，它来源于市场的、改革的、历史的、西方的和民间（浪漫化）的象征资源的相互作用。也即，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衍生型象征资源。一方面，它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也不是一个体制预期的目标，因此它与其他资源类型存在着或强或弱的张力关系。另一方面，它一旦生成又是“新”的资源，与其他象征资源差异并存于新闻体制的内外空间。换言之，新闻专业主义有它的自在性和生成性。

中国新闻人的专业价值观,或者说在中国话语空间运作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不再是西方式的专业主义观念,而是一种新的“生成物”,融合西方观念、党派主义、士大夫传统和商业化因素的混合物。这种混合式的新闻专业价值观包括:马克思主义积极改造社会的哲学主张;执政者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士大夫心怀天下的情怀;文人论政与进谏的传统;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专业价值的认同;媒体商业化运作产生的与国家权力中心的分离意识;等等。这一新闻专业价值观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难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保持同一性,很难划上等号。但是,这并不妨碍“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套强韧的修辞。因为它是作为游牧主体的正当化话语策略运用的,它是以一种理想、愿望或想象,以一种改造的姿态出现,因而往往体现出感性色彩和模糊性。换言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实践话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情境、批判学者所揭示的解构性以及中西差异都不是其核心所在,它是一种游牧思想,其否思性(anti-thought)对应着它的实践性和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游牧”与逃逸线

虽然在新闻业实践的总体上,新闻专业主义并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但它正是中国新闻业改革最有力的表征和最具有方向感的进步。作为衍生物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厄处境从根本上来源于它与权威象征体系之间的不兼容性,一种不被体制接纳而无法赋予“承认”(recognition)的现实,决定了它的游牧命运。

基于历史和权力现实,“命令型新闻体制”曾提供并垄断了新闻从业者的象征资源,并形成一整套新闻宣传模式和话语模式。它们是国家装置的一个环节,以同一性为核心。国家装置是一种层化的组织,通过束缚、攫取或直接捕获而运作。层化就是将一切物质固定成形,并将它们限制在系统之中。“层是捕获的行为,就像那些‘黑洞’竭力吸引住所有那些进入其作用距离之中的事物”(德勒兹,伽塔利,1987/2010: 504-505)。游牧的主体(德勒兹称之为“战争机器”),对应于“国家机器”)却致力于瓦解层的组织。国家装置建立层化的“条纹空间”(即层化的空间),而游牧的战争机器则要逃离和瓦解条纹空间,并构筑“平滑空间”。在德勒兹那里,游牧者是竭力从同一性编码中逃逸的反抗者和战斗者。

当新闻人谈论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改造新闻界的愿望。新闻人感知新闻行业的种种乱象和体制内外的二元对立,不满于一个“纷繁复杂与精神分裂”的

新闻界(石扉客,2010)。一个“南方”的记者,和中央媒体记者一起去采访报道,发现和体制内的这些同行几乎无法交流,说话方式不一样,思维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生存方式不一样,所谓体制内外,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和两个世界。(傅剑锋,2010)记者罗昌平描述曾供职过的一家带有“典型事业单位特色的弱市场化媒体”,“那里既无系统的新闻技能培训,也无职业操守的界限”;沈亚川(石扉客)将自己在中央某媒体的经历归纳为“夹缝里左冲右突疲于奔命的生活”;等等。(李红涛,黄顺铭,2014)对于许多新闻人来说,“体制内”工作经历是职业生涯的“低点”,游牧或逃离(身体的或心灵的)是不得不做的选择。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他们展开新型新闻实践的话语资源,也凝聚着塑造新闻界的理想和愿望。

随着市场化改革、新闻视野的开放和范式的转向,新闻象征资源在实践领域内形成了多种范式的竞争和博弈,业内新闻评价标准、价值理念和阐述框架出现分化和破碎化。从德勒兹的“眼睛”看来,多样化、分化和破碎化即是生命主体的“逃逸”(nomad),在其裂缝中划出逃逸线(flight lines)。逃逸线存在于象征资源褶皱的深处,生发于一些“点”、碎片或者块茎,这些点可以是人物、形象、事件,也可以是仪式或话语,可以固化为文本,也可以流动于实践之中,群星闪烁,灿若星河。那些“另类”的中西方著名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体以及经典的新闻作品、新闻事件(如法拉奇、克朗凯特、丹·拉瑟、华莱士、彼得·阿内特、“60分钟”、《纽约时报》、“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文件案”、“掏粪运动”、普利策新闻奖、密苏里模式等等),那些曾以办报重入舆论中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以及那些兼承报国精神和西方新闻业气质的民国杰出新闻人和新闻组织(如邵飘萍、张季鸾、新记《大公报》、储安平),无不以文本、影像、案例、符号和作品呈现在新闻课堂、业务论坛、电子博客、虚拟社区等不同形式的话语空间。历史与现实交光互影,“润物无声”地为中国新闻业新型实践提供替代性的象征资源,培育新闻工作者与准新闻人的专业意识和职业梦想。这些外部的、历史的、异质性象征资源的氤氲配合着“成名的想象”,塑造着主体的实践行动及其话语,不断开辟着思想的游牧空间和逃逸路线。

当我们回顾1990年代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的历程,它既是思想游牧的产物,也实际处于一种游牧的状态之中:一种流散的、未科层化的自由支配状态。它体现为一种持续“生成”之中,突破严谨固定的符号体系藩篱,挣脱同一性和权威资源的象征暴力,发挥“逃逸路线”的功能(汪民安,2013: 274),生动、鲜活、充满创造力,但是,它又处于的边缘、局域地带,具有之间性、实验性和脆弱性。新闻专业主义

话语虽然在研究领域以及部分实践社群中成为“主流”的语汇，但是它从未进入国家主导性的象征范畴，也难以与市场绩效主义相兼容，它的独立和对抗精神与权力精英的国家主义底色相悖。因而，新闻专业主义在体制内至今没有合适的话语登陆点和正当化表述，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实践空间，流散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和未完成形态是它的主要特征。

在事业原则和有限空间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改造实践是通过对既有制度和象征资源的策略性运用和索引性表达来完成的，改造者必须寻找出体制与实践的话语相容点，并借此建构一套与原有规则似是而非的新话语体系。尽管这个新话语体系在不断“构筑、阐述与正当化”新闻人的专业主义实践，但它对正统意识形态权力的解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在生存逻辑上难以逃脱市场和国家的双重收编(周翼虎,2011)。而在一个价值感残缺而分裂的新闻界，无论是依靠道德勇气，还是市场空间，新闻专业主义没能培育出它的理想面貌，未能廓清它在中国情境中的内涵和外延，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在这个变革的年代，人们见证了市场社会如何将媒体工作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见证了政治化新闻体制所力图压抑的各种社会要素如何破茧而出，成为新秩序的基础。然而，伴随着改革的进展，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那些构成旧秩序的社会关系和力量重新登场与作为新的宰制力量的市场驱逐力量合谋(汪晖,2008:2)，迫使新闻专业主义重新沉潜于象征资源的沟回地带和褶皱深处。

许多研究者意图弥合这种多元现实的分歧，建构一种调和性的路径，并意图嫁接出一个中国式新闻专业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情境结合起来，使之实现逻辑自洽。有学者主张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要件，取其适合国情的部分，建设体制内的新闻专业主义(樊昌志,童兵,2009)；有学者主张将新闻专业主义链接“文人论政”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媒体依导向主义和专业主义的标准分类运作(支庭荣,2014)；有学者主张在文人知识分子的“底色”中寻求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替代资源(芮必峰,2010)；有的主张循序渐进，制定逐步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步骤；有的在狭义新闻专业主义范围内展开讨论，精进操作技艺，推进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以谋求拓展微小空间(李红涛,黄顺铭,2014)；有的主张依据国情，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上发明新概念，如“发展新闻专业主义”(杨保军,2013)。无论这些路径、步骤和问题建构指向何处，它们都意味着变异和差异产生的可能性，意味着“新”的酝酿。

四、一个新闻专业主义游牧空间：“凝视”普利策奖

正如杜赞奇(1995/2008)所提示的,理解历史的建构应该关注外来事物、制度本身的逻辑乃至偶然性。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游牧,不仅需要对制度情境进行分析,外来事物和偶然性因素也是重要的视窗。

普利策新闻奖是新闻专业价值的象征,也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承载“容器”和范例。作为世界最知名的新闻专业奖项,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受到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的瞩目,随后,一年一度的普利策奖评选和颁奖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网络化、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奖项超越异域边界,通过去辖域化的赛博空间,周期性地传播到中国新闻人的话语空间,介入他们的话语论述“河流”,并激发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想象与讨论。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是象征资源褶皱中主体游牧的产物,那么普利策奖提供的就是一个临时生成的游牧空间,即一个游牧主体翻越符号藩篱、脱离同一性编码和反抗意义等级制的话语空间,一个萌生思想、情感与实践行动的“块茎”(rhizome)。在新闻专业主义“可欲与可得”的困境中,“凝视”普利策新闻奖是特别的象征仪式,它的游牧政治通过镜像、“凝视”与阈限这样的文化机制来运作。

早在20世纪30年代,拉康就讨论了“凝视”对于自我的构成功能,并先后引入“镜像阶段”和“想象界”的模式来做理论化的阐述。他的镜像阶段理论建立在一个镜子装置的基础上,而这个镜子装置同时也可看作是一个观看装置,一个捕捉和结构我们的表意活动的装置——理想自我的构成是通过认同我在镜中所看到且是想象地看到的那个镜像而完成(吴琼,2010)。普利策新闻奖对于中国新闻业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类似这样一个镜像装置。正是通过这个观看装置,借由这种镜像“凝视”,新闻人省察自身的制度环境,展开关于荣誉、声望、职业成就和社会承认的想象,并编织未来新闻业的理想图景。

普利策新闻评奖既是一种历史传承,也是一次行业盘点,是专业精神的浓缩,也是一个重申规范和准则、共享意义和信仰的周期性仪式。涂尔干(1915/2006:367)指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因而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象征人类学认为,仪式是信仰的表征,是参与和分享,是情感的唤起和精神感召。仪式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仪式过程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仪式与其社会情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连带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形成群体团结和团体成员身份的符号。(格尔茨,1973/2008;柯林斯·兰德尔,2004/2009:36;欧文·戈夫曼,1959/2008)而这种情感连带与仪式过程,包含阈限

的交融性(维克多·特纳,1995/2006:129),也构成了“凝视”的过程与意义。普利策新闻奖在网络社群中的凝视、读解与象征运用,成为一种浓缩的多样态的文化实践:比如业务技能的学习和讨论、召唤身份认同、探析行业前景,并藉此展开制度性反思。它一方面刺激新闻人的理想主义忧郁感和“生活在别处”的迷思,也使得这样的一些问题得以集中浮现: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到底将走向何方?是坚守为“不死的神话”,是幻化为真实而又虚无的“异托邦”(米歇尔·福柯,1966/2002),还是成为一种调和化了的中国式新闻专业主义?在这其中,个体的主体性如何呈现,新闻人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份政治。所以凝视普利策奖是一个文化整合的机会,是新闻阐述社群的一次精神阈限。

正如凝视、阈限理论往往都引向“身份政治”的批评实践一样,中国新闻阐述社群的“凝视”也不可避免地指向了自身。讨论普利策新闻奖,常常引发对现有新闻生产秩序和新闻评奖制度的批判话语,并拓展至对新闻体制的讨论。当这种批判和讨论延伸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其结果是建构出一个反思性空间,并孵化一套以“普利策奖”为中心符号的抗争话语脚本。

由于现代传播的视觉化特征,普利策奖的新闻图片是传播力最强、关注度最高、最具文化超越性的部分。人们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模仿与象征性再创作,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在网络空间帖出一些极富冲击力的摄影照片或图片,生成一套诸如“这张照片应该得到普利策奖!”的话语语法。这些照片有如下特征:第一,极具现场感和情感冲击力;第二,主题集中在底层疾苦、城管暴力、征地拆迁、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等;第三,语言讽喻性和语义双关性,以“普利策奖”为话语必备元素。比如新浪微博博主@思想聚焦曾贴出一张照片,并发微博:

“【见闻】这是我在天涯上看到的很震撼的一张照片,城管抓走了他们做小贩的妈妈,这孩子仇恨的目光让我感动,想流泪。这眼神对世界的失望。一个孩子理想社会的坍塌,是对这样万恶的社会的控诉。照片可以得普利策奖了。”

同样地,2013年2月网友在新浪微博贴出一张照片:一位年轻母亲被广州城管反铐住双手,蹲着亲吻哭泣的小女孩。虽然整张照片并没出现城管人员,但手铐、汽车等冰冷物件,地上狼藉散落的货品,母女温情和幼儿眼泪,甚至小女孩的花围裙这些视觉元素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极大地刺激人们的情感,瞬时引爆数千个话语链。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在美国,这张照片一定是普利策奖!”。

在这里,普利策奖溢出了它的文化边界,派生为底层抗争的表意文本。这是对现实的抗议,也是一种曲折的隐忍表达。通过反讽、仿拟和戏谑等修辞,“普利策奖”话语成为社会抗争的符号,并形成一种网络时代的表达与观看的语法。

这些极具震撼力的新闻照片在社交媒体空间扩散流动,在转发、评论与再转发、再评论之间形成的话语链条中,“普利策奖”成为正义的象征物,观看的主体因而加入意义的生产与协商。词与对象的象征关系被拓展,视觉符码被接入新的现实,继而演化成为另类的文化实践。在互联网时代,拍摄与围观是一种独特的视觉政治,照片、图像、视觉符码之间极易形成强大的互文关系,并且超越语境。对它的解读已不仅仅需要观看,更需要意义的诠释。苏珊·桑塔格说:“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它意味着你把自己置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像知识,因而也像权力的关系。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准则的同时,也改变并扩大我们对什么才是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力去看什么的观念。”(苏珊·桑塔格,1977/2008:3-4)在附着权力关系的观看与凝视中,“普利策奖”话语被抽离出原有的新闻专业主义范畴,语义情境被迁移和转换,并溢出它的文化边界,被演绎为一套抗争话语。正是借由互文、反讽、仿拟与象征性再创作等修辞实践,人们将“普利策新闻奖”话语的表意层次从浅层的“镜像阶段”带到深层的“符号阶段”。在文本与其衍生文本的交互中,包含了赋予时代意义,并形成欲望和情感结构,知识、代码、观念、价值和文化实践的整体性关系因而溢出既有的边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利策奖”在中国不只是一种专业话语,而被激活为一套民间语言修辞,一种具有情感承载力和文化生长力的象征元素。

游牧空间是开放的、创造性的空间。普利策奖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游牧空间,所呈现的功能是复杂的,既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想象空间、一个业务技能的学习空间、一个共同体整合空间和身份政治的反思空间,又是一个链接社会议题、表达社会抗争的话语空间。它体现了德勒兹的块茎思想:异质性、开放性、裂变性以及反谱系性,通过植入其它维度,以模拟、合成、续写、改写、拼贴、连缀、戏仿等方式完成新闻专业主义的地方性编码。正是通过这样的逃逸、共融和地方性编码,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个“跨文化旅行”的概念。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有陷入低潮之势,但是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是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这显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意味着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仍有不确

定性和阐述空间。总结起来,国内对新闻专业主义问题有两个分歧点:一是“有没有”或“是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二是是否承认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性以及如何嫁接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德勒兹主义视角来阐释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变化,有益于丰富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视角,也为理解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的轨迹提供一条另外的解释路径。

德勒兹主义的概念体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即世界不是“存在”的(being),而是“生成”的(becoming)。换言之,存在论的根本是“变”,而不是“在”。一个概念、文本离开原来的历史语境而刺入当下,便是德勒兹所说的存在论层面上的“生成”。“生成”是形成“差异”(becoming different),而非形成同一性。也就是说,在德勒兹主义的视角里,新闻专业主义进入中国当下,不是再现性和对应性的,而是一种“新”的生成。生成的意义不在于提供规范性或前瞻性,而在于提供一种实践探索的思想资源,一种可能性和自由精神。

德勒兹强调历史不是线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时间结构,事物之间不必是线性的“进化”或取代关系,而通常是共时性的复线演进过程。在德勒兹看来,尽管很多概念、文本和资源埋藏在地层学的底层或褶皱的深处,但是它们却以叠置的方式同样存于当下。福柯的“知识考古”,正是将这样埋在地层中的“知识档案”,重新链接当下的权力关系。而德勒兹则进一步沿着它们自身的脉络和进路,发掘它最内核的论旨,并努力将它从时代性和地域性的“重重包裹”中抽取出来,从“地层”刺入到当下的“地表”,从而生成意义和“新”(吴冠军,2010a)。生成是不合时宜(untimely)的权力,一个运动过程(科勒布鲁克,2002/2014:71),它不根植于确定的事物之中,也不追问“你将生成什么?”的问题,它不涉及再现和一致性。生成意味着游牧,意味着解域化和逃脱编码。生成始终处于居间(in-between)之中,这种居间状态还意味着它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因此,德勒兹主义进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不需要去强调“历史”或“现代”、“西方情境”或“中国传统”的区分,跳出二元论述的框架,不特权化任何一个维度,亦不必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预设,或去追问它未来的形态。我们要做的,就是超越历史和地域性的教条,在当下重新激活它们,使之对我们当下的问题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吴冠军,2010b)。

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中国当下的意义,在于它回应了新闻业矛盾、分裂、充满对峙、“捕获”(capture)和“逃逸”(flight)而又实验不辍的现实,它是一个“鲜

活存在本质上又总在消失之中”的否思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雷蒙·威廉斯,2003）。在某个细微之处，某个缺口，行动者寻找逃逸的路线和创造自由空间的可能。因此，不论面对什么困境，新闻专业主义会寻找自己的出口和逃逸线。中国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权威象征体系、市场绩效以及其他投机意识的对峙和挑战，但如巴赫金所强调的那样，所有的思想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意识的对峙并不寻求透过辩证的发展得到解决，或融合为统一的精神，而是没有终结的、也不可能完成的过程，它只可能不断生成。福柯提出的关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拓扑学（topology）也指出，权力具有自身路线的连续性特征，具有自身环节的毗邻性特征，并没有明确的极权（程党根,2005a）。

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一样，德勒兹主义不指望突然的变革，而宁愿设想某种积极实验的政治。在微观层面，这种实验寄希望于欲望和情感层面的“解码”和解辖域性，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细微情感、思想和行为的改变，使其日益渗透到制度中。在宏观层面，这种实验寄希望于各种逃逸线、解辖域化力量以及“战争机器”的顽强抗争，以便解放被辖域和编码的各种流变。（程党根,2005b）逃逸是从封闭的、等级的思想统制中逃离，从专断的符号系统和强行的意义等级制中逃离。但逃逸不是逃跑，也不是回避，而是一种主体实践，一种创造性的实验和拓展，是把思想和实践带入一个“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一个不由意义的等级制而由多元性决定的游牧王国。在这个视角上说，新闻专业主义的轨迹，本质上是一种游牧政治。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可以描述为碎片化、局域性和实践性的新闻专业主义（陆晔,潘忠党,2002；李红涛,黄顺铭,2014），而且应理解为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生成中的自由精神的实验与实践。

（责任编辑：涂凌波）

引用文献 [Reference]

Marks, John (2006). In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deleuze, the virtual and cybernetics. In I. Buchanan & A. Parr,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爱弥尔·涂尔干(200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版）》（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15).

[Durkheim, E. (2006).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st Editio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5).]

陈阳(2008).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个案.《国际新闻界》,(8),65-69.

[Chen, Yang(2008).Two kinds of performance of profess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 case study of Nanfang Weekend and Caij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8), 65-69.]
- 陈永国(2004). 德勒兹思想要略. 《外国文学》, (4), 25-33.
- [Chen, Yongguo(2004). The outline of Deleuze's thoughts. *Foreign Literature*, (4), 25-33.]
- 陈永国(2010).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Chen, Yongguo (2010). *Nomad thinking: a textbook of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
- 程党根(2005a). 在欲望与权力之间: 德勒兹与福柯思想互动探析. 《天津社会科学》, (4), 16-20.
- [Cheng, Danggen(2005a). Between Desire and Power: an explore to the reaction of Deleuze and Foucault. *Tianjin Social Science*, (4), 16-20.]
- 程党根(2005b). 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视域: 游牧政治学.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5), 49-53.
- [Cheng, Danggen(2005b). The Postmodern Horizon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5), 49-53.]
- 德勒兹(2001). 《福柯·褶子》(于奇智, 杨洁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8).
- [Deleuze, G. (2001). *Foucault: the Fold (Trans.)*.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8).]
- 德勒兹(2005).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于1995).
- [Deleuze, G. (2005). *Negotiations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德勒兹, 伽塔利(2010).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千高原》(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7).
- [Deleuze, G. & Guattari, F. (2010).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7).]
- 杜赞奇(2008).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5).
- [Prasenjit, Duara (2008).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Trans.)*.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樊昌志, 童兵(2009). 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 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新闻大学》, (3), 22-29.
- [Fan, Changzhi & Tong, Bing(2009). Mass Media in Soci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Quarterly*, (3), 22-29.]
- 傅剑锋(2010). 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 《南方传媒研究》, 26.
- [Fu, Jianfeng(2010). The Vis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26.]
- 格尔茨(2008). 《文化的解释》(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3).

- [Geertz, C. (2008).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Trans.)*. Nanjing: Translation Press.(Orin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 郭恩强(2011).理论的旅行: 重思职业社会学脉络中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国际新闻界》,(9),59-64.
- [Guo, Enqiang(2011).Reconceptualizing Chines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9),59-64.]
- 郭镇之(2014).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 中国的问题.《国际新闻界》,(6),6-15.
- [Guo, Zhenzhi(2014).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and Media Ethics in Ag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Chinese Issu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6),6-15.]
- 柯林斯·兰德尔(2009).《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于2004).
- [Collins, R. (2009).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Orin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 科勒布鲁克(2014).《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2).
- [Colebrook, C. (2014). *Gilles Deleuze (Trans.)*.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Oringinal work published 2002).]
- 雷蒙·威廉斯(2003).《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台北:远流出版.
- [Williams, R. (200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Taipei: Chuliu Publishing Press.]
- 李红涛,黄顺铭(2014).谋道亦谋食:《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4).
- [Li, Hongtao & Huang, Shunming(2014).Seeking Value and Seeking Survival: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and Practical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4).]
- 李金铨(编)(2013).《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Lee, Chin-Chuan (ed.)(2013). *To Serve the Nation: Journalists as Prisms of Chinese Press History*. Hongkong: Hong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李良荣(1995).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3-8.
- [Li, Liangrong(1995).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Journalism Reforms in 15 Years. *Journalistic Quarterly*,(1),3-8.]
- 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北)》,(71).
- [Lu, Ye & Pan, Zhongdang(2002).Imagining Professional Fame: Construc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s Transform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Taipei)*,(71).]
- 麦永雄(2007).光滑空间与块茎思维: 德勒兹的数字媒介诗学.《文艺研究》,(12),75-84.
- [Mai, Yongxiong(2007).Smooth Space and Rhizome: Deleuze' s Digital Media Poetics.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12), 75-84.]

米歇尔·福柯(2002).《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66).

[Foucault, M. (2002).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欧文·戈夫曼(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59).

[Goffman, E. (2008).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潘忠党(1997).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 (3), 62-80.

[Pan, Zhongdang(1997). Journalism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Reconfigur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 62-80.]

潘忠党,陈韬文(2004).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新闻学研究》, (78), 1-34.

[Pan, Zhongdang & Chen, J. M.(2004). Journalistic Paradigm Shift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Evidence From Media Exemplar Evaluation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8), 1-34.]

芮必峰(2010).描述乎? 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 (1), 56-62.

[Rui, Bifeng(2010).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the Practice in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1), 56-62.]

石扉客(2010).反暴力是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南方传媒研究》, 26.

[Shi, Feike(2010). Anti-violence is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of Constructing a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26.]

宋志标(2011).忧郁的新闻专业主义.《南方传媒研究》, (9).

[Song, Zhibiao(2011). Depresse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9).]

苏珊·桑塔格(2008).《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7).

[Sontag, S. (2008). *On Photography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邵蓓(2014).《德勒兹生成思想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北京.

[Tai, Bei (2014). *A Study on Deleuze's Thoughts of Becoming*.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Beijing Foreign University. Beijing]

汪晖(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20世界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

[Wang, Hui (2008). *The De-political Politics: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1990s*. Beijing: Sanlian Press.]

汪民安(2013).《文化研究关键词》.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

[Wang, Minan (2013). *The Keywords of Culture Study*. Taipei: Rye Field Publications of Taiwan Cite Publishing Ltd.]

维克多·特纳(2006).《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1版)》(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5).

[Turner, V. (2006).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1st Edition)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吴飞(2009).《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Wu, Fei (2009). *A study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吴冠军(2010a).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哲学分析》,(3),166-195.

[Wu, Guanjun(2010a).How to Inspire Classic Thoughts: A Deleuzian Approach. *Philosophical Analysis*, (3),166-195.]

吴冠军(2010b).邓正来式的哈耶克——思想研究的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开放时代》,(2),133-148.

[Wu, Guanjun(2010b).Deng Zhenglai' s Hayek Studies: a Deleuzian Approach to Ideological Study. *The Open Times*, (2),133-148.]

吴琼(2010).他者的“凝视”:拉康的“凝视”理论.《文艺研究》,(4).

[Wu, Qiong(2010).Gaze of the Others: Lacan 's Theory of Gaze.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4).]

杨保军(2013).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3),82-89.

[Yang, Baojun(2013).A Possible Choice of Dominated Journalism Outlook of In contemporary China: Developmental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3),82-89.]

支庭荣(2014).实践新闻专业性,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4),5-16.

[Zhi, Tingrong(2014).Practic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to Achieve News Publicity: A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5-16.]

周翼虎(2011).《中国超级传媒工厂的形成:中国新闻传媒业30年》.台北:秀威资讯科技.

[Zhou, Yihu (2011). *The Formation of China Super Media Factory: The 30 Year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in China*.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